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TATECRAFT

时殷弘 著

本书汇集了作者撰写的若干论
 文，上编谈国际政治及战略的
 思想方法，并且联系国际体系史等
 作论述。下编谈国家大战略发
 展，讨论中国战略机遇期内的
 方向和在当前国际环境基本战略
 中汇集了作者撰写的若干论
 文关于国际政治的历史认识
 和研究方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STATECRAFT

时殷弘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时殷弘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
(未名社科菁华·国际关系学)

ISBN 7-301-11160-6

I. 国… II. 时… III. ①国际政治—文集②发展战略—中国—文集 IV. ①D5-53②D6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5558 号

书 名: 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

著作责任者: 时殷弘 著

责任编辑: 徐少燕

标准书号: ISBN 7-301-11160-6/D·160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121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53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1968 年底,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中,我读到初中二年级便下乡插队,在农村共经历了八年多。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仅仅依凭兴趣和求知欲读了很多书,包括当时有中译本的众多欧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也包括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几乎所有著作。《资本论》第一卷我读过三遍,第二卷读过两遍,第三卷读过一遍。通过这些书,我开始懂得一些社会的哲理,而且为他们书中讲的“正义”、“革命”和科学态度所感染。此外还有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著作。与此同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我通过自学使自己的英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下乡的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人知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又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过程。这样一种经历与个人最基本的生活和命运紧密相连,感受自然就比较深切。下乡使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一个真正的农民中国。相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们那一代人对社会有强烈的关注,同时在我们中间很少有人真正能被抽象的自由口号全身心地吸引,因为我们较多地看到中国的真实,体会到它们包含的许多特性。我们希望中国改革,但是不会去迷信一种纯政治和纯西化的答案。一方面,我们处在中国的快速变迁过程中,尤其是处在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进步之中,因而我们可能永远会怀抱进步的希望,而不会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们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不会非常罗曼蒂克,以致变成完全被抽象的自由所吸引的人。

1977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国家恢复高校普招入学考试,我进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在那里读了一年半的本科后,按 1979 年特有的政策,提前报考本校美国外交史硕士研究生专业并被录取。当时



我选择美国外交史这个专业,一是由于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进程,外部世界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在智识意义上非常有吸引力,而美国是其中最具有智识吸引力的。再加上当时我与周围的同学相比英文比较好,而且南京大学在英美研究方面也比较好,所以我选择了这个专业。不仅如此,我内心对于当代的、现实的问题更感兴趣。我过去所做的关于美国外交史的研究都是属于当代史部分的,特别是二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我对比较早的历史如现代早期欧洲的历史产生兴趣,是在硕士学业完成之后。

我1981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其中1985起师从王绳祖教授,在职攻读国际关系史博士研究生专业,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3年起任国际关系史教授。我在南京大学一共任教17年,那是我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与现在我从事工作的北京相比,在南京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而且在南京大学获得和阅读我这一行的书籍有特殊的便利。这种环境很有利于精心做学问。1998年,我离开南京大学,特批入伍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国际关系教授和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我从大致专注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变为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实际上是个很自然的过程。国际关系史是个边缘学科,离开历史系的时候,我就学术能力来说既能作国际关系史研究,也能作国际关系理论和当前国际政治研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共任教三年,受益良多,成果良多,特别是撰写了许多论著,总的来说自己对它们很满意,同时作为主要学术带头人,与同事们一起申请成功了军内的第一个国际关系博士点。2001年8月我从军队转业,进入现在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那时至今发表的论著、译著、论文和评论总量超过以往。

我从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到1997年,其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作战后美国外交史研究,发表的有关成果也很多,其中不少论题是国内甚或国外都没有人做过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更多的是做国际关系思想理论、国际政治现状和国家对外战略研究,其中许多是关于怎样从大战略角度对待中国自己的问题。如果说我二十余年来有什么学术贡献的话,我自认为有三方面:一是我的研究形成了一种被接受的笼统的方法,还有一种被接受的思想风格;二是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我提出了某些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对外关系问题的新的重要观念;三是我写了一批有学理价值的作品。



由于我是攻读和研究历史出身,有相对比较深厚的历史学问功底;同时,相对于其他一些同样从事国际关系史的学者而言,我比较有理论意识和理论能力。不仅如此,过去在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很大的阅读量,对我的研究和思想非常有益。此外,我一直坚持对中国自己的问题的关注,并且能够较独立和很少功利考虑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我对自己的历史学“出身”和较有理论意识与理论能力这两点特别珍视。目前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有一些历史感比较强的学者,但是像我这样真正从事过长时间的历史研究的仍属极少数。我曾在十几年里专门研究二战以来的美国外交史,这样的经历与单单读一些历史书籍不同,因为学者只有亲身在历史学领域做过相当长时间的严格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有深层的历史考察体会,真正懂什么叫历史研究。这样的研究背景对国际政治学者往往是重要的。

我的历史学“出身”首先就决定了我对历史考察和思考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和衷心的重视。其次,历史总是教人要谦虚一些:历史证明人的认识能力、预见能力和成功地自觉塑造基本事态的能力相当有限。再次,凡是比较懂得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机械、宿命和刻板地看待世界;他们总是会承认偶然性的巨大作用,总是承认某种变更的可能和深刻的不确定性,总是意识到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在成功的同时也有失败的可能。最后,搞历史学的人一般来说非常尊重经验和直觉,而对那些被较狭隘地当做“科学”的东西远非崇拜。当然,搞历史学的人有时也会夸夸其谈,滥用所谓的博学,或者成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知道的过去的东西比较多,看过的历史图景比较多,历史变迁意识比较强。他们一般比较谦虚。谦虚就是认识到人类的局限,认识到任何一个人的智能局限,这种认识非常重要。

学者个人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特征的形成是个过程。例如,政治学出身的人一开始会很自然地按照政治学的方法去做,虽然他自己当时可能对这个方法的理解还比较粗浅,对它的潜能和局限都认识得不够。做得多了,才会逐渐地对这个方法进行反思。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更多地看到大学问家写的东西,看到他们怎么做学问和怎么对待方法。一般来说,读大学或读研究生时可能会觉得做学问很了不起,大凡写在书上(特别是写在名著上)的方法都值得自己衷心倾慕;然而慢慢地自己从事学问久了,就可能对很多东西变得熟悉和具有可靠的评判力,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大师和真正适宜的方法就不会像原先那么庞杂了。



在现在的学者中间,有一种是“专家”,在自己从事的具体领域很在行也颇有贡献,然而不大能从这种人那里听到和看到可称为智识才华的表述。还有一种是本来意义上的“学者”,颇有智识才华或曰思想性,有的时候能想一般同行所未想,言一般同行所未言,而且如此并非昙花一现。这两种学者都需要,但后一种层次可能更不易达到。我是属于很长时间内做过很多纯粹专家性的工作的人,例如我的颇大一部分著作和论文都是研究国际关系史上的具体问题和过程的。但是,大概我还能超越“专家”的层次,去接近或者努力达到“学者”的层次。“学者”绝对需要有比较好的知识基础和专业技能,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方法、视野和见解方面须有一种自我意识,即要超越一般研究具体问题的层次,有一些广泛的思想,有将若干较小的方面联系成一个较大的整体的意识和能力。另外,“学者”既要有较多的能作为基石的、扎实的具体研究成果,又不能仅仅限于这些,而没有较能直接显示智识才华或思想性的著述。

有学者认为,就方法而言,我国国际关系研究还处于像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那样一个大争论时期,即科学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争论。主张科学主义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用科学方法认真做,其中有些做得很好,而另一类是标榜科学方法,但没有认真作出什么踏实地使用科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因而他们标榜或提倡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没有真正地去专心实践的抽象的东西。一种方法在某些问题、某些领域真正有用,甚至有时比较优越,但是绝不能说它在大多数甚或几乎所有领域都如此。例如要微观地研究某些情况下的危机处理,科学方法大概可能更有用。但是,如果要研究比这大得多和复杂得多的问题,科学方法就不行或不大行。因此,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传统主义,都可以有两种研究者:一种是不但有分寸地(即认识其局限性地)提倡某类方法,而且自己用这类方法认真去作研究,同时作得比较好;另一种则是无分寸地、排他地提倡某类方法,同时并未拿出自己的可以真正例解所倡之物的成果。

科学方法有其重大甚至伟大价值,但迷信和滥用科学方法也会有很大弊端。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领袖赫德利·布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指出,这些弊端主要在于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忽视根本而专注于边际,忽视实质而专注于形式,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对本身研究结论的适当的怀疑态度。我在一篇文章里讲过,不是说应当抛弃或轻



视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而只是说应当更新这一方法,使之切合当今的较先进的认识世界的水平;也就是说,不要停留在牛顿那个时候,而要看看和学学现在的自然科学家的思想方法。传统方法当然也有其重大局限和固有或易有的缺陷,然而一般来说,运用传统方法的学者不像科学主义者那样说自己的东西多么精致,多么可靠,甚至绝顶高明。他们主要关注和企求的,不过是试图理解历史和现状里面蕴含的部分涵义和经验,如果这些多少被理解了涵义和经验对将来还有用处的话,那就更好。这是一种比较有限、比较谦虚、比较有自知之明的追求。

不能将“理论”一语的意义想得太狭隘,似乎一定要是某一种形式的才是理论,其他都不配称理论;也就是说,不能认为理论非得是以概念化和概念规定为基础、以命题为枝干的逻辑性组合体系。这样一来,理论就会排除许多并非如此或不怎么如此的理论思想财富,就会太狭窄太刻板。同时,目前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人中间,尽管很多人关心中国的事情,但是有机地将理论作为一个资源,以便理论化地探讨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努力还很不够。我习惯用理论思想四个字,就是希望多少冲淡理论的“理论”色彩。读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伯克或兰克等古典或近现代思想家的著述,甚至读尼布尔、凯南或马丁·怀特等现当代国际关系思想家的著述,就会发现他们远不是在谈我们许多人所说的理论,然而他们的思想非常丰富,包括富有哲理。现在有些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或学生将理论著作看得太窄了,几乎一定得看战后的、“新的”,甚或一定得看美国人的新的,而且似乎形式越复杂、概念越玄乎越好,这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病。

另外,某些作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人的研究大多与中国要对待的基本问题联系得太间接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中间也有许多人有类似的毛病。有些理论家写的理论论文很少有人看,而且他们除了理论论文外几乎从来不写别的东西。与之相反,某些富有理论思想素养的学者虽然其理论并非显山露水,但密切联系实际问题的,而且有理论思想提供的眼界广度和思考深度,其著述真正很有影响。一个作品有多少人感兴趣,有多少人会看,尽管远非衡量国际关系研究的唯一标准甚或头号标准,却是很重要的标准之一。因为国际关系研究(哪怕是理论性研究)一般而言,不应是纯粹的阳春白雪,不应充斥其实多半大可精简的专业“行话”,不应满其实是同样往往大可简约的玄奥的逻辑过程,甚至不应觉得对一个问题发表有深度的思考以前定要有一个所谓理



论。有些问题的探讨不需要那样的理论,或者暂时还形成不了如此意义上的理论,但是仍然有比较深的道理要要说。做学问和做其他事情相同的一点,在于必须尊重(尽管并非盲从)常识,不然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花费很大力气、绕了很大弯子得出的东西,其实是较简单地就可以解决的,甚至解决得更好。理论不单在内容上,而且在方法和表述形式上都应该百花齐放。我们不是仅从所谓新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建构主义者那里吸取理论思想营养。我们要吸取的理论思想营养出自一切能够很好地对国际关系体系进行思考(特别是较自觉的理论化思考)的人们。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感谢该社的有关策划者和责任编辑,使我能够向读者献上本书。

本书汇集了我近几年撰写的若干论文。上编主要谈论关于国际政治及战略的历史认识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并且展示在现代国际体系史等领域作的某些论述。下编侧重于从国家大战略的视野出发,讨论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应有的战略方向和在当前面对的多项基本战略问题。

作为中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讨论者,我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是说中国的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成为世界强的前景。它们尤其与东亚经久的基本和平、基本稳定和有序变迁密切相关,与中国和主要大国总的非冲突性、非经久敌对性关系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它们也与中国在必要的场合和必要的问题上勇敢坚决、明智有效地捍卫和促进自身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并且紧密地联系到中国应有的自身进步以及政策与战略的优化。兼顾所有这必须兼顾的四大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头等的大战略问题,而大战略观念的特征在于根本目标挂帅的全局观念或总体视野,在于特别集中地关注手段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在于不断关心任何一项对外政策或战略的成本效益——不仅是它自身的,而且更是它在总的利益和权势格局中被衡量的成本效益。在所有这些方面,广泛深刻的历史理解大为有益,犀利得当的现实评估必不可少。



目 录

上 编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3)
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	(16)
历史理解的巨大潜能与局限	(28)
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31)
国际关系史料基本分类和主要类别史料例解	(46)
现代国际体系史的一大理解范式和根本主题	(65)
从欧洲体系到全球体系	
——现代世界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	(75)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的世界政治	(90)
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	(103)
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122)
美国国际权势的基本状况、新近变动及未来走向	(131)
美国对伊战争的战后困难.....	(138)

下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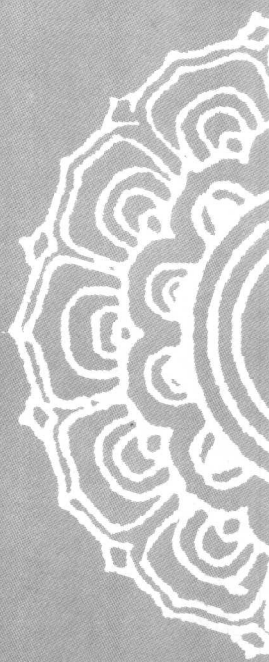
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的基本问题	
——步入 21 世纪之际的思考	(145)
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	(162)
风物长宜放眼量	
——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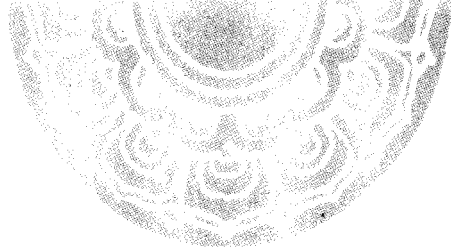


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190)
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十五年：演化过程、基本经验和尚存 问题.....	(207)
中国崛起的条件：从对外关系角度出发的讨论	(216)
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考验和必要“平台”.....	(227)
关于当前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若干问题.....	(232)
中国人应有何种国际眼界和对外政策舆论.....	(238)
东亚区域多边主义体制与中国对外政策.....	(243)



上 编





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

历史研究有下列三类基本目的,或者说基本功能:一是“经世致用”,二是“智识兴趣”,三是“人类自我认识”。

经世致用大概是一般人甚至许多历史学家谈得最多的历史研究目的。然而只需粗略地分辨一下,就可以看出有两种大不相同的经世致用。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一种是简单化类比的、

*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我不是史学理论家,而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学者,因而在此主要是从自己所事领域的局部和特定的视角出发,谈论若干体会和见解。它们可以具有较广泛的意义。



机械的、甚而庸俗的，既不真正精当地辨识、探究往昔的事态及其确实的形成原因，更不足够具体地考察、分析现今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趋势，而是很简单地用历史来比拟现在和未来。另一种经世致用则达到或接近达到兰克当做根本的历史哲理来强调的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①，即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探寻历史共性的意识，另一方面则充分尊重历史个性，同时本着一种多少是合理的怀疑论立场和开放性思维保留历史“模式”变迁的可能性，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具体地认识活生生的现实。在前一种经世致用史学当中，除去例如“幕僚史学”、“御用史学”和“道德说教史学”之类可谓最低劣的形态，还有着比较受尊重、甚至在一段或长或短的现代历史时期里被许许多多人衷心推崇和盲目信仰的权威形态，那就是多少随意地调度或拨弄史料和史例，以便发现、论证和例解“科学的铁律”。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影响（甚而声誉）显著超过克劳塞维茨的19世纪军事史家约米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其笔下，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居然失去了同旧制度下七年战争的巨大实质性区别，而对所有这些战争进行研究的动机和结果，是搞出寥寥几条他所称的“不变的战略科学原则”，以便用于无论何种战争。^②在马汉的海权史当中，对史料和史例的拨弄导致了例如极严重地夸大制海权对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的意义，甚至达到了被他本人当做基本的研究方法来向整个美国历史学界公开倡导的地步。^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位相信“科学铁律”的经世致用者要将英国世界优势的历史秘诀，教给他同代和后代的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同这些人相反，修昔底德那样的伟大史家从对于历史严肃认真的探究、思考和总结中，自觉地寻找后世可以借鉴的深层历史经验。通过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博大精深的论述，他体会和提炼国际政治的本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国内政治对于对外政策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的性质和行为特征、海权

① F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 chapter 15; 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欧洲》1998年第4期，第4—10页。

② John Shy, “Jomini”,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3—185.

③ Philip A. Crowl, “Alfred Thayer Mahan: The Naval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 *op. cit.*, pp. 444—477, esp. 449—455.



与陆权的战略含义、国家大战略的要素及其成败原因等。^①而且,他展示出来的国际政治机理是那么丰富,那么“非规律化”,以至当今西方一位很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仍盛赞其“复杂的现实主义”(the Complex Realism),认为它优于此后近二千五百年里西方所有主要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脉流。^②还有兰克。这位现代历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论列强》之中,就国际关系史而言划时代地提出了一大基本模式和一大基本趋势,那就是先前两百多年里欧洲国际体系内权势格局反复变更的模式,加上民族主义兴起和民族国家扩散的趋势。但是,也正是在这总结历史、启示未来的雄文的结尾部分,他极有力地强调了那个与简单化比拟和机械性类推正相对立的哲理——绝对的个性与相对的共性的有机统一。^③

“智识兴趣”(intellectual interest 或 intellectual pleasure)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之一。尽管这并非物质利益至上论者或自我中心主义者(不管这“自我”是指本人、本集团或本阶层,还是指本民族、本国甚或本文明)所愿接受或承认,却是一项不言自明的常识。正如利益考虑虽然极为常见并且通常至关重要,却不能囊括人类行为的所有基本原因那样,经世致用绝不能概括历史研究的所有基本动力。大致而言,这里所说的智识兴趣分为两类。一类是现象本位的和狭隘的,甚至是猎奇性的,有时特别流行的一些“阴谋史学”、“英雄史学”或“偶然性史学”等,便是其中较低劣的例子。另一类智识兴趣,是以认知事态本身内在的机理、特别是那些同经久流行的俗见相违的内在机理为主要目的,再加上对丰富生动的历史悲剧、喜剧或讽刺剧的“鉴赏”。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当然需要有价值取向和设身处地式的情感移入,而且事实上也大都都有归属或倾向于本集团、本阶层、本民族、本国或本文明的好恶和利

① 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 (London: Frank and Co., 1996), chapters 2—4; Jacqueline de Remilly, *Thucydides and Athenian Imperi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3), chapter 1 of Part I, chapters 2—3 of Part II; Donald Kagan, “Aenian Strategy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William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4—25.

② Michael 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1997), chapter 1.

③ “The Great Powers”,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3), pp. 65—101; 时殷弘、郝莹:《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国际政治观》,第7—10页。

益关切。但尽管如此,有如站在“上帝”或“外星人”立场的那种超脱(或许也可以说,站在宏观历史和人类本身的高度上的那种超局部、超时代意识),至少有时是需要的和可贵的。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就离不开这种超脱,司马迁的《史记》应当说也是如此。取小者而言之,当代美国的头号德国史泰斗和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学家之一戈登·克雷格发表过一篇文章——《论阅读外交文书的乐趣》,略为夸张地说是大师级史学家才能写出的佳作。^① 这样的智识兴趣并未妨碍(或许还促进了)他对德意志第二帝国和纳粹德国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抨击。要达到很高层次的超脱,特别需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斯多葛精神”:具有极明确的自由资产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勇敢、坚决地揭示了将导致本阶级衰落的一个法则——利润率倾向下降,从而被马克思誉为“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②。历史研究的智识兴趣的最高主题,也许可以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一语来表述。这里的“天”可理解为必然性,“人”大概可以理解为偶然性和主观选择。这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其历史哲学中的必然与自由(命运与自由)的关系,或曰历史的大力量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历史研究的第三类基本目的——人类自我认识,指的是作为民族、文明甚至全人类的人对于自身的意识和认识,它也可以称为人类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fying)。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此,人作为群体与个人的基本区别之一也在于此。现代史上,有两种探求人类自我认同的方式:历史主义于19世纪兴起以前,人们主要是像启蒙学派那样(当然也同自然法信仰者与经典现实主义者那样)规定人——说到底多半是个人——的先验的本性,历史主义兴起后则越来越广泛地以历史进化、历史展开的观点,考察人的群体的演化。^③ 它虽然会因为思想转化为物质力量而对历史的实际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但很难说是

① Gordon A. Craig, "On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6, No. 3—4 (September 1991), pp. 369—384.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篇,尤其是其中第287、310页。

③ 参见Fried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对于这部经典杰作的一项高水平的概述和简要评价,见W. Stark's Introduction to Meinecke, *Machiavellism*, pp. xxxvii—xli.

